

北溝的故宮

蔡玫芬

——從一封未及寄出的信說起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至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故宮文物典藏於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的北溝地區，人少事繁，地狹箱多，而這些博物院的前輩們，一方面「以古物為生命之一部分」維護、清點遷運來的文物，一方面編目、研究、出版、展覽，奠定了故宮今日的基礎。

在故宮舊雜物櫃中，看到一

封墨筆書信：

孟真先生道鑒：上月趨前聆教，獲益良多。出警入蹕圖遵命晒就。茲就那志良先生來台北之便，特請代為送呈，敬乞察收。此間正從事前古物陳列所銅器清理，惟參考資料缺乏，進行頗感困難。聞先生藏有容庚著《武英殿彝器圖錄》一書，如檢出方便，擬懇賜假半月，藉

作熱河行宮藏品檢查根

據。用時自當小心保護，用畢當託受人奉還，不悞。如蒙俯允，公私銘感。肅此，敬請教安。後學譚旦岡謹上。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圖一）

這是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譚旦岡先生（一九一六—一九九六）向國立台灣大學傅斯年校長（一八九六—一九五〇）商借書籍的信件。筆者曾經好奇這封信為何未曾寄出？經

查才詫異的發現，此信書成的次日（十二月二十日），傅校長於省參議會上腦溢血過世。

民國三十九年底，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文物才剛安置於台中不及兩年，物質匱乏，書籍更不易羅致，然編目、考訂的基礎研究工作已然展開。以今日故宮同仁能上網尋找典藏文物圖片、大量電子圖書供應辦公室內閱讀資料，還有堂皇的圖書館開架閱覽書籍，等等研究設備來看，不能不佩服故宮前輩同仁們在北溝時期所曾奠下的根基，他



圖一 譚旦岡先生給傅斯年先生的信件（1950年12月）

們開箱點檢所有文物，寫下清冊，所編輯的《故宮書畫錄》、《故宮瓷器錄》、《故宮銅器錄》等書籍，至今仍是研究故宮藏品最基本的用書。筆路藍縷，這些當年的典藏功臣們離鄉背井，在台中霧峰的北溝，度過艱辛而勤奮的歲月；而他們透過各樣出版物，將兩院文物的魅力散佈各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係於民國五十四年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遷來台北後共同組成的機構。初創之始，由圖書館學者蔣復璁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九一）為院長，副院長二人由故博的負責人莊嚴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〇）與中博的負責人譚旦岡先生分任，後二位先生即為文物遷台前期，為兩院肇劃研究發展方向之最有貢獻者。這樣的組合，也說明來台的兩院，原來既密切關聯又各自獨立的關係；他們從聯合

播遷，到抵台安置楊梅、台中糖廠、霧峰北溝，一直常相伴行。

故宮文物首次在台亮相，其實早溯自對日抗戰勝利後文物復員回南京之始。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後，原疏散到大後方的各單位文物逐漸分批運回首都南京，直到三十六年十二月，才終於完全運完，分別移交原機關後，即行開箱檢查、晾曬、登記、核對。此期間，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日間，譚旦昉先生與一批中央博物院的銅鏡已經先行運來台灣，在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內的省立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舉行「台北文物展覽會」，這編號「古一四一箱」的文物大概是故宮與中央兩院文物最早與台灣民眾見面者。同時，莊嚴先生也應教育部邀，隨「台灣訪問團」來台演講；可以說後來中博、故博在台兩位負責人已先文物之來台而認識台灣了。「古一四一」箱文物在四月返南京後，不料十二月又



圖二 1948年5月，故博與中博同仁於南京聯合展覽會前合影。前排右一譚旦昉、右三高仁俊、左四曾昭燏；中排左三索予明、左四莊嚴、右一吳玉璋；後排右一吳鳳培、聯字前李霖燦、覽字前周鳳森。



圖三 六機關聯合辦事處會議記錄，1948年12月。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1029

隨第一次遷台文物運來台。這一年，中央博物院的新館正館在南京落成（即今日南京博物院），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八日，故宮與中央兩博物院共同在此舉行「聯合展覽會」，共陳八個展覽室，盛況空前。（圖二）聯合展覽會後，政局變化詭譎，秋季，為了文物安全，再次議及文物遷台，並即於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海軍中鼎輪由南京下關裝載文物箱件開出，二十六日抵

台；此後三十八年一月九日招商局海滬輪運來第二批文物，二月二十二日第三批文物由海軍崑崙艦運至。總計這三次運來的文物，除了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為主的文物外，還包括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外交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六個機構的文物（以及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的器材），故曾有「六機關聯合辦事處」的臨時機構。（圖三）

故宮文物自民國二十二年初

開始南運至三十八年抵台的一段遷運史，早已有莊嚴、那志良（一九五—一九九八）、譚旦侗、杭立武（一九三—一九九一）諸先生所回憶記述的一手史料，兼且為各個報刊媒體影片所引述，為博物館史中最受矚目的一段故事。實則文物抵台後，也曾遷徙過好幾個庫房，雖然均在數個鐘頭的距離內，不甚遠，交通也多稱便，只是箱件搬運置放、軍警戒護，都是費心費力之事。



圖四 台中糖廠倉庫外觀，1949年。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90

二、來台後，第一個棲身所為楊梅的通運公司倉庫，抵台文物從基隆港以火車運往該地。三十八年一月初再由台中糖廠撥借兩棟倉庫，於是，除史語所文物仍留楊梅外，中博八五二箱、故博二九七二箱、中圖六四四箱、北圖一八箱的文物遂在今日台中市振興路暫得棲身之所。（圖四）三十八年八月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稱「聯管處」），第一任主任委員為教育

部長杭立武先生，而原負責各院館遷台事宜的莊嚴先生為故宮博物組主任（圖五）、譚旦岡先生為中央博物組主任（圖六）、顧華先生為中央圖書組主任；雖然事權

經費似掌於聯管處，實則各組各依原有組織條例規程辦事。民國九十三年以參事退休的石川榮先生，說他在民國四十八年至聯管處任會計，而第一個派令是由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所具銜，此可見一斑。後來，四十三年中央圖書館北遷設於台北市南海路荷花池畔的館址，電教器材也於次年交回



圖五 故博組同仁於糖廠倉庫外，1949年7月攝。
左起：劉峨士、張德恒、吳玉璋、楊師庚、莊嚴、牛性群、那志良、黃居祥、吳鳳培、申若俠。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94



圖六 中博組同仁於糖廠倉庫外，1949年。
左起：高仁俊、索予明、周鳳森、譚旦岡、李霖燦、麥志誠、張銀武。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90



教育部，因此四十四年聯管處更名為「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一般仍以「聯管處」稱之。杭立武先生在抗戰期間，以中英文教基金會之職協助文物在南京陷敵前遷運離京，後來再以故宮董事會秘書及教育部次長、部長身份倡議並執行精選文物遷台，與兩院來台初期發展關係甚密。四十五年八月杭氏受命外派為使節後，主任委員一職，先後為孔子聖裔孔德成先生、行政院副秘書長何聯奎先生（民族學家，一九三三—一九七七）擔任。此外，三十九年兩院共同理事會成立，理事長先後有李敬齋先生（地政學家，一九八七）、王雲五先生（出版家，一八八八—一九七九）；而聯管會主任委員為理事會秘書。這項組織架構直到民國五十四年兩院文物北遷外雙溪，共同組成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止。

台中火車站附近振興路糖廠的屋子在近年已售出拆除，但吾人若從現在故宮南部院區附近的

嘉義蒜頭糖廠區連棟高聳寬敞的廠房，當能想見當時台中糖廠文物庫房的情形。

從民國三十八年的照片看來，廠房內的文物木箱放置整齊，但堆疊甚高（圖七）。譚先生記錄：「中博院第三批文物計八五二箱，集中第十一號倉庫右邊，略就箱件大小及類別分為十六行，八行為一邊，中留寬空道，靠壁為單行，餘兩行並列，中有窄空道。每行視箱件大小，



圖八 北溝庫房內的文物箱，1950年代



圖七 糖廠倉庫內的文物箱，1949年。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90



圖十 北溝庫房建成後，1950年。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50

累為五至七層。每箱各製有方位卡，全部箱件製有方位索引卡，檢查時立時可以查出箱件所在地，開箱時由有關各股共同進行，事畢登記於開箱登記簿。

「《了了不了集》頁九八一」這種木箱堆疊方式，與北溝庫房相同（圖八），直到台北故宮初期，山洞庫房依舊類似，技工友們熟練的攀爬挪移，讓人佩服，但每次



圖九 北溝空中俯瞰圖，1957年。左方U字型三合院為庫房，庫房後為山洞；右方建築為陳列室。一般民眾由右下方道路進入院區，即步入陳列室。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57



圖十二 台中振興路聯管處辦公室外同仁合影，1954年元旦團拜。右起：吳鳳培、施德明、金自古、黃居祥、高仁俊、張炳輝、任蘭、張德恒、申若俠、詹冠南、杭夫人、吳玉璋、杭立志、李霖燦、莊嚴、蘇瑩輝、熊國藻、應強、廖士毅、周鳳森、汪繼武、楊師庚、黃家漢、顧華、梁廷煌、詹繼志。

開箱都是十分費工的大事。此後六十年代才逐漸更換鐵箱，七十年代庫房擴充後，情況才獲得改善；而新建收存管理較便的架櫃，使文物提存歸放更省時省力。

三、

雖然糖廠庫房空間尚稱足夠，但此時執事者已經感受到四千四百八十六箱文物集中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庫房，並不十分妥慎，於是三十八年秋勘查中部郊區，選擇租借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北溝一處林姓耕農的農場，並於三十九年一月，由台灣工鑛公司施工，四月中旬，聯管處的文物全部遷入北溝的新建庫房中。至此，文物算是有了正式安身之地。北溝地方，「背負群峰列屏障，面對蕉林萬甲田」（莊嚴，〈留別霧峰洞天山堂題壁〉詩），遠離都市塵囂，是典藏研究的好所在。

（圖九、十）

不過，在此流離飄搖的大時代裡仍讓人對安全有深刻的懸



圖十一 北溝山洞庫房初成。1953年12月。
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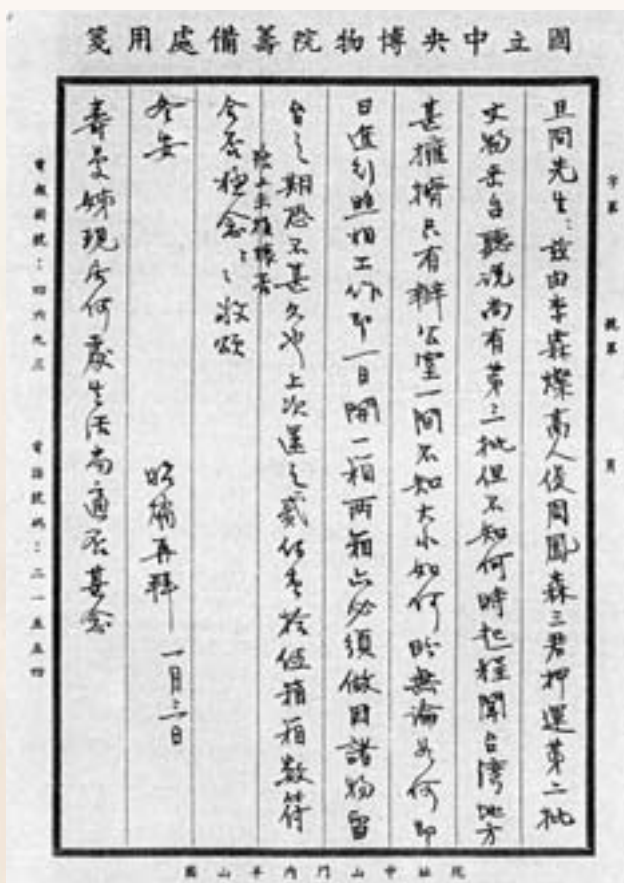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台灣製片廠影城所見當年的山洞庫房，1993年，譚旦岡攝。
引自《了了不了集》上，頁100

念，四十一年七月，理事王世杰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八一）提議在庫房附近開建山洞，其後請款興工；四十二年底在庫房背後建成一U形山洞，（圖十一）兩院各選提部分文物貯存其間。這些選提的精品，又另編為臨時性的「洞」字箱，後來也成為第一批北運外雙溪，提供台北故宮開展

文物的主力。北溝是庫房，振興路聯管處的房舍則一直使用到文物遷移台北之前。（圖十二）聯管處的辦公室除了是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常務理事們的辦公處所，同時會計、人事、總務等行政人員也在此，每週或每月，北溝例行都有人員來此辦事，坐著公路局車

來，或騎鐵馬僕僕而來，領薪、報帳等等；仍住振興路的故博小吳先生（吳鳳培，以示與大吳先生吳玉璋區分），每日往北溝去時就常被委以各種傳遞的事務。石川榮先生回憶，民國四十八年他才完成學業，即受他的老師會計金自古主任之邀到此振興路聯管處上班，當時生活拮据，晚上



圖十四 曾昭燏1949年元月3日來函。引自《了了不了集》下。

還到商職兼課，熬夜寫講義，刻鋼板。

那時候大家都這麼過，他還年輕，是本地人，其他從大陸來的兩館押運同仁，拖家帶眷，異鄉度日更是不易。還好，鄰近中興新村的省會、霧峰的省議會，都是中部公務人員群聚區，樸素斯文之風，倒使居北溝、台中一帶的兩館同仁，有自在的生活面。「鳳木花開一樹紅，相思葉

瘦若眉弓」（莊嚴〈仲夏吉峰間居〉詩），思鄉之餘，同仁們逐漸能閒雅的欣賞中台灣的景色。而載在國史館檔案的，還有每年總統的特別獎賞，為年終增添許多歡樂。自民國四十三年起，總統每年叮囑發給故宮一筆「年節金」（國史館檔案）。「當時我每月薪水新台幣三五元」，一生為會計的石川榮還記得這些數字，「每年總統賞全院銀二萬元，我大約

能領到四百多元。」這是其他單位少有的福利。只是這筆錢總數一直沒有增加，而幣值變動，員工擴增；筆者在民國六十年代末期曾領過此賞銀，那只是一張紅色百元新鈔的寥寥之數了。

北溝的房舍，在五十四年故宮中央兩院北遷至台北市外雙溪現址後，改為台灣製片廠的影城，拍攝電影外，曾是中部著名的遊樂區（圖十三）。不過，譚先生在回憶錄中慨嘆其面目全非。至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後，該地與霧峰一帶多數建築一樣慘遭損壞，今已廢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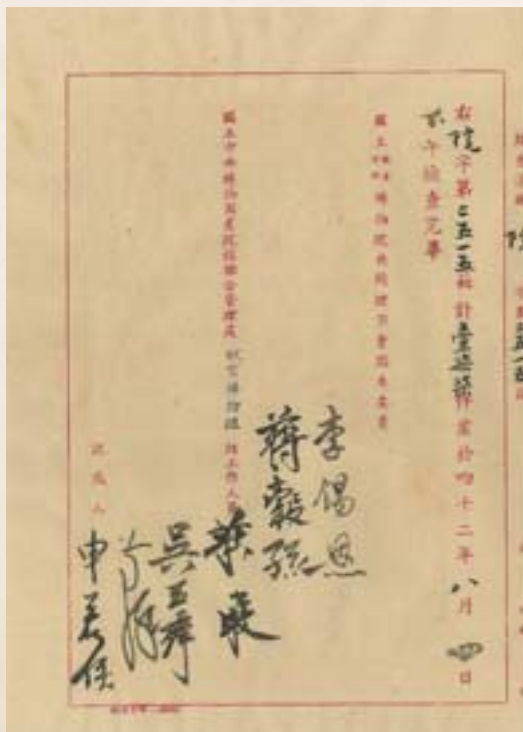
四、就如前述所列庫房遷移的時程，在文物遷台初期幾乎都在規劃庫房空間、文物箱的堆挪位置、點查箱號、防濕、防蟲、安管中度過，然而這期間文物開箱、點查、編目、研究、出版的工作，皆未曾稍歇。
譚先生的回憶錄中，載錄第一批文物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抵台時，南京方面曾昭燏在三十八年一月三日已指示：「聞台灣地方甚擁擠，只有辦公室一間，不知大小如何？盼無論如何，即日進行照相工作，即一日開一箱、兩箱，亦必須做！」（圖十四）因此，在文物遷至糖廠倉庫後，中博與故博同仁即開始開箱、登記、照相、編目等工作（圖十五）。來台箱件依序編列流水號，再依此箱號開箱登記真正抵台文物的清冊；這份整理出來的清冊，經抄寫、刻鋼板、油印，



圖十五 麥志誠（左）、周鳳森1949年於糖廠庫房編目中。引自《不了了集》下，頁991

是為「存台文物品名及件數清冊」，至今仍是故宮同仁平日開箱選件依憑的老帳。中博文物在登記時同時進行攝影保存；故博文物數量龐大，因此以抗戰前在上海大清點的滬上清冊為對帳依據。正式的大清點，在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進行抽查清點，兩院理事會理事與教育部所委託學者專家們組成清點委員群，以驗證來台文物的狀況。（圖十六）由於委員們多有教職，清點時間遂



圖十六 裝箱清冊上點查委員的簽名。

多在每年暑假六月至九月間。在點驗報告中，因文物在箱中狀況穩定正常，因此點查委員會召集人羅家倫在報告中加上「保管人員能以古物為生命之一部分」語，確為護持文物南北顛沛播遷並安置台灣的這些兩院人員之最佳註腳。在四、五年代裡，一般民眾生活樸素平淡，少有文化活動，故宮遂如一個磁鐵，緊緊凝聚許多愛好藝文者的關注。參與故宮事務者，從檯面上的名單，



如歷任聯管處主任委員、管理委員會理事、文物清點委員及後來的赴美展覽委員會等，聚集了王世杰、朱家驊、傅斯年、李濟、杭立武、梅貽琦、張道藩、王雲五、黃少谷、羅家倫、陳雪屏、



圖十七 中央博物院銅器、瓷器卡片

五、文物的編目卡片是研究的基礎，也是展覽選件與認識文物的先期作業；這項作業雖然在大陸時期便已經開始，但編目卡片多

馬壽華、蔣毅孫、高去尋、顧獻樑等位先生，他們來自政界、教育界，但也多為收藏家、考古家、藝術家，是藝術文化的愛好者。他們對文物的認識與宣揚，也牽動了社會大眾對中國藝術文物的欣賞、認知與創作風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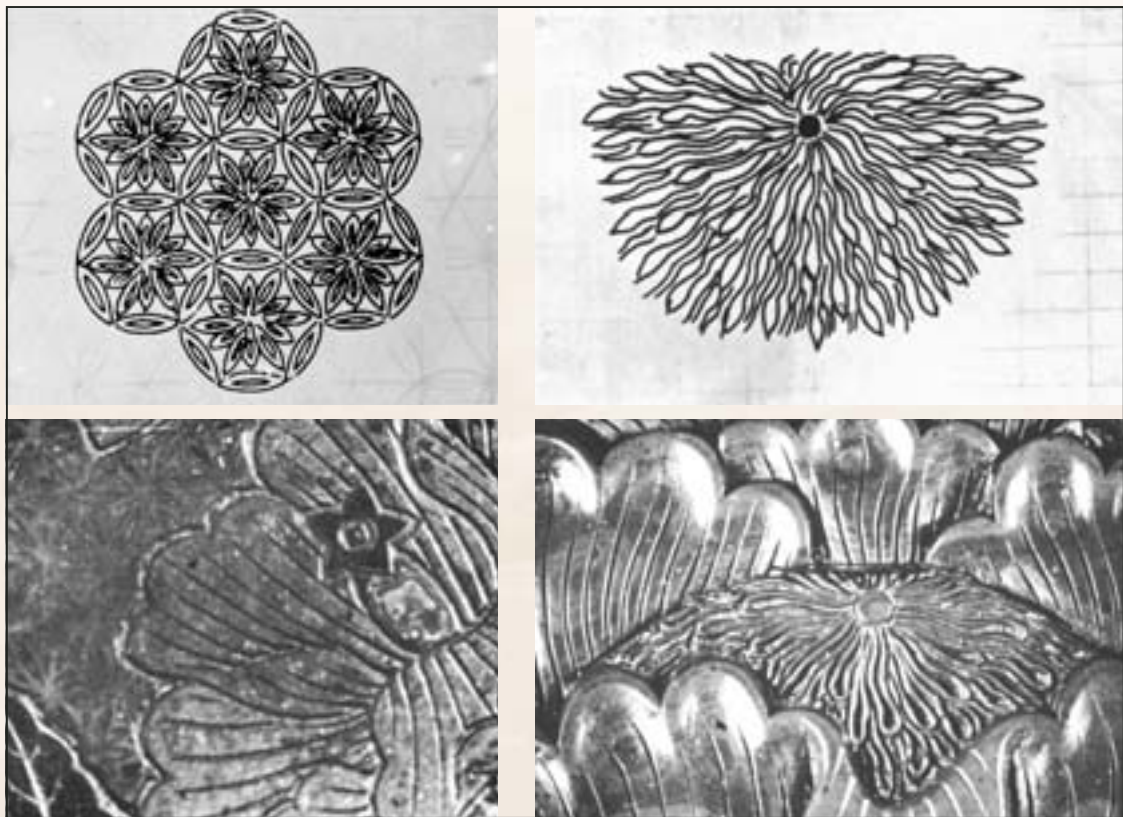


圖十八 定窯白瓷印花獅紋盤（線描圖） 中瓷4746

五、翹楚；後來故博吳鳳培先生編寫《中國古代雕漆錦地藝術之研究》（二九八二）的錦地圖案，也秉此方式，一筆一筆的繪成（圖十

厚薄得以呈現（圖十七）；如定窯之類單色劃花、印花的瓷器，得以藉線描而觀察復原一般為釉遮去的花紋（圖十八），這樣的圖片是研究的參考，也是展覽時很好的輔助說明。當時的中博人員幾乎個個擅長繪圖，如索予明先生、高仁俊先生、周鳳森先生（二九二三—一九九六）皆此中

不及攜出，於是台中期間重新全面進行此項工作。每件文物需要丈量尺寸、重量等基礎資料，並作形制、紋飾的描述，也就必須近距離的觀察描述各種特徵。故博的瓷器編目，較側重於花紋、款識、釉色的描述；中博的編目，往往還要再加上線描圖。不但銅器幾乎件件線描，使形制、花紋、



圖十八 雕漆錦地局部，吳鳳培先生繪

九。兩院的編目卡片都是費時費工之作，尤其後來為了出版書冊，往往卡片文字還得增刪修飾，或者再重新謄寫、複寫，以利排版印刷。至於中博所繪近乎原大的線描圖，還得有專人再將之縮繪在卡片上。高仁俊先生開玩笑說：「當時專注的繪圖，也是消磨時間的方式。」的確，北溝小村，毫無消遣去處，只有將點滴時間灌注，讓文物重現其生命。

近年來故宮庫房資料庫也將這張細膩的繪圖掃描放入，以有助於研究者的時時瀏覽思索。

抄寫、複寫、刻寫銅板、油印，這都是現今年輕人難以想像的，但在沒有影印機的時代裡，知識便是如此字字抄錄而來。《古玉圖籍彙刊》（台北：漢華，一九七八）即是故博那先生從抗戰到北溝所讀玉器相關書籍，一字一句抄錄，並且對著光線就原書一圖一圖繪成；再看他的著作《玉器通釋》（香港：開發，一九六四），許多圖片亦係他親手所繪，觀察



細膩，故能成著名的玉器專家。

六、

從開箱編目始，文物的推廣、編印、成書等等的作業紛紛而起。

《故宮書畫錄》，民國四十四年編輯完成，四十五年刊行，依序文所記，「編纂者：莊尚嚴、那志良、譚旦侗、吳玉璋、梁廷煒、李霖燦；襄助纂錄者：張德恆、申若俠、吳鳳培、蔣雍、高仁俊、周鳳森、索予明、麥志誠、詹繼志等」。亦即兩院同仁全部參與編纂或抄錄。此書參考歷代御藏書畫編目體例，並以乾隆《石渠寶笈》等宮廷藏編作為藍本，一一按驗原蹟，正誤補闕，界定名目；將當時所認為的精品編寫入錄，是為「正目」；次品只錄畫名，編入「簡目」。《故宮銅器圖錄》，民國四十六年編竣，四十八年始版印成。全書依書畫錄例，也分正目、簡目，後者只列品名，前者則攝有照片。書的編纂也由兩院同仁共

同完成，序文所列有譚旦侗、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李霖燦諸先生參與纂記、甄拓、照相而成。

《故宮瓷器錄》，原欲依銅器錄例附以圖片，但因經費所限，只能取消圖版；此書只編成宋代、明代二輯五冊，後因遷台北，事更繁多，清代部分遂未能編輯完成。該書主要由吳玉璋先生與譚旦侗先生編寫成。前述兩部藏品錄尚有清宮舊藏《石渠寶笈》、《西清古鑑》等書為參考，瓷器錄內容則依形制、紋飾的特徵描述，名稱依據清點所審定品名。自民國五十年編印成首冊，他冊亦陸續印成。

時至今日，考古發現日多，藝術史的研究領域也日深日廣，使文物認知有大幅度的成長；上列三種藏品著錄或非完善，但編輯時對文物觀察的詳細，使其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基本用書。

《故宮瓷器錄》序文中稱北溝的環境：「院中人少事繁，地狹箱多，執事諸君，翻箱啟匣，

崇朝纂寫，寒暑無間。」這確實說明了當時編纂出版的實況。上述三書外，北溝時期出版的書籍至少還包括：《中華文物集成》

（民國四十三年出版，是文物抵台第一部刊物，共有銅器、法書、名畫、瓷器、版刻等五種共七百零七幅圖片。因向亞洲基金申請補助，因此成立出版部，設置照相室）、《中華文物影集》（民國四十一年，教育部出版，包括各存台文物機構的選件十七組類）、《中華美術圖集》（三冊，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中華叢書出版）、《故宮法書》（以珂羅版印出，日本大塚巧藝社製版付印，分人分輯印成）、《故宮名畫三百種》（民國四十八年出版，日本東京大塚巧藝社印行，珂羅版精印，是故宮文物運台之後出版品中印刷最精的一部刊物）、《故宮藏瓷》（民國五十年，香港開發公司彩印，分類分冊，共二十六冊）、《晉唐以來書畫家款印譜》（五十二年，起編製，香港開發公司印行）、《中

國文物圖說》(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初版，遷台北後兼以英文印行)。

七、

聯管處主任委員何聯奎在《中國文物圖說》的序文中述該書執筆者：「莊尚嚴先生、蔣雍先生、合撰法書；譚巨岡先生，撰銅器及中央博物院概況；那志良先生撰玉器、琺瑯、圖書、文獻及故宮博物院概況；吳玉璋先生撰瓷器、漆器；李霖燦先生撰繪畫、圖像；索予明先生撰雕刻、文具、織繡。」這幾乎說明了北溝時期研究者的狀況，他們各有專精卻又必須博通，「人少事繁」，然書籍編輯與展覽選件布置都需合諸人之力完成。所以索予明先生之漆器研究至今仍為國內最精湛者，而他對文具、繅絲的研究亦有不可忽視的見地。吳玉璋先生以瓷器為長，也對漆器、服飾有所認識；他行事細心謹慎，著作雖不多，但若問詢，瘦高的他會彎身與你細述該

件瓷器之形式，厚薄大小重量、裝飾配置、胎釉精粗等等特徵，如數家珍，可見研究用心之細微。

譚巨岡先生雖以銅器名家，但他在瓷器方面的著作量亦為兩院最夥者；由於早年曾從事民間手工業調查(《民間工藝圖說》)，使他對技術的形成與進行一直有敏銳的觀察，後來與清華大學合作用中子活化法來研究古器物的元素，亦他所倡議。而他辦事幹練，凡文物遷徙、院址覓尋，以及對外出版、研究計畫及一些學會的組成，常經他的籌畫參與。李霖燦先生抗戰時在雲南的調查，已是麼些語方面著稱的民族學者，而在繪畫史方面的著作風行最廣。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的陳葆真曾如此形容他：「文筆清新，偏好以小品文方式敘述作品特色和來龍去脈，而不作嚴肅的學術論辯。他幾部重要的著作，多呈現這種寫作風格。因為如此，所以他能有效地引導初學者入門。在中國美術史的推廣教育

中，李先生是個開拓者。他輕鬆愉快地將藝術欣賞融合在日常生活當中，形成了藝術生活化的典範。」

那志良先生文筆的淺顯動人，也藉著報章雜誌，影響成群的文物愛好者。他的玉器研究可說是七十年代之前國內外首屈一指者；而他習於掌故，在北溝時期所寫關於竹牙雕刻、清明上河圖、文獻掌故的文章，傳誦甚廣，將幾件故宮名作的形象深深的印入大眾的腦海。

莊嚴先生可說是北溝時期的靈魂人物。他瀟灑飄逸、謙和風趣的文士風範，讓兩院同仁如沐春風。在長期主持古物館其間，來往碩彥均為他博學真誠的生活態度所折服。莊先生的書法成就廣受推崇，瘦金體字尤為一絕，習書臨摹中對中國書法史有獨到的體會。他的著作多專注於所編纂書籍中對每件文物的描述與評價，用字簡潔精要。其論著與演講教學中，對文物鑑定方法、作品真偽、字體風格、絲絹紙張、



圖十九 北溝陳列室一景，1957年。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56

墨色印款的闡釋等，多能精確確實，言必有據；且因早年從事燕下都考古工作，故論述中也重視地下出土文物的證據。

莊先生、譚先生、李先生、那先生、索先生、吳先生都先後在中部、北部的大學院校教書，他們精湛的研究不斷地傳遞給年輕學子，風趣生動的言談，激起更多愛好者走入中國古代藝術殿堂。我常常想，故宮為世人所知的國寶名品，實為諸先生在民國五十年代之前，以言以筆宣揚而深植人心的啊！

八、

民國四十六年在美國亞洲協會資助下，北溝院區建了展覽館（圖二十），內有二十四個展覽木櫃，可陳列器物與書畫作品，每週開放四天（五十年十二月後改為開放六天），而每三個月更換一次書畫展品的規矩也在此時確立。原先文物在北溝安居後，便不時有慕古之士聞風前來要求特別參觀，但都只能在庫房中拉開



圖二二 國外學者相繼來訪：(A) 左起：席克曼（納爾遜博物館）、富田（波士頓美術館）、李佩（大都會博物館），1958年5月於北溝庫房外，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714



圖二一 蒲柏1956年11月在北溝庫內觀瓷。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723

長桌觀看，空間十分狹仄。（圖二一）自陳列室開放後，北溝遂成為中部旅遊的重地，民眾川流不息，至今仍有許多中老年人記得幼時輾轉舟車拜見故宮文物的欣悅感受。常務理事王世杰、葉公超等，屢屢回憶其因公務路過中部，便順道來北溝觀看名蹟；海外學者戴維德、李佩、蒲柏、喜龍仁、梅原末治等等聯袂而來（圖二二）。這之後促成了民國五十



(D) 喜龍仁、莊嚴1956年5月於北溝庫房外。引自《故宮、書法、莊嚴》，頁49



(C) 莊嚴、譚日昉、戴維德爵士夫婦1956年12月在北溝庫房觀瓷。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725



(B) 梅原末治1956年在北京觀拓銅器。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716



圖二三 1965年11月故宮初遷台北，由左後方前眺的院景。

年故宮文物赴美巡迴展事；也促成佛瑞爾美術館的高居翰與密西根大學艾瑞慈及堪薩斯納爾遜博物館的席克曼等拍攝故宮藏品之舉。

北溝展覽室的成功，使政府當局思考台北展出的必要性，於是，文物又要搬家了，這次安厝在士林外雙溪。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博物院建築落成，（圖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在此展出。

參考書目

1.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一九九〇。
2.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台北：中華叢書，一九五七。
3. 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台北：台灣商務，一九八〇。
4. 昌彼得、馮明珠編纂，《故宮七十星霜》，台北：台灣商務，一九九五。
5. 莊伯和、莊靈編輯，《故宮·書法·莊嚴》，台北：雄獅，一九九九。
6. 黃克武編纂，《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二〇〇〇。
7. 譚巨岡編纂，《了了不得了》（上中下冊），台中：興臺印刷，一九九四～一九九五。